

明末五部上古史演义小说的史料来源

纪德君

明代末叶,历史演义小说中出现了五部以上古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分别为《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和《开辟衍绎》。

《列国前编十二朝传》^①,四卷五十四则(笔者按,该书目录虽列五十四则,但正文中有时两则或三则连叙而不加标目,实际只有五十则),三台馆梓行。每卷卷首题“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編集”。封面上端题记云:“斯集为人民不识天开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诸事迹,皆附相讹传。固不佞搜采各书如前诸传式,按鉴演义。自天开地辟起,至商王宠妲己止,将天道星象、草木禽兽,并天下民用之物,婚配饮食药石等出处始制,今皆实考,所不至于附相讹传,以便观览云。”全书结尾又云:“西伯自释囚归国,广修德政,天下诸侯多归之叛纣,纣愈淫乱不止,杀戮谏臣,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此传乃自盘古氏起,传三皇五帝,至纣王丧国止。”此处所言之《列国传》、《列国》,乃指余邵鱼编写的《春秋列国志传》,其所叙史事,起自武王伐纣,止于秦并六国。原刊本今已佚。余象斗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予以重刊。据此可知,《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当在《春秋列国志传》重刊之后,才由“余象斗”編集、问世的,其用意是为了与《春秋列国志传》所叙衔接,故在结语中不忘“推销”自刻的《列国传》。日本学者大冢秀高在天理图书馆发现一种《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首有《叙历传始末》,署“崇祯二年夏五月□□日书”,云:“但未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诸朝事迹。今民附相讹传,寥寥无实。惟看鉴士子亦只识其正要,而更有不干正事者,失录甚多,未入鉴中。今不佞搜采各书,若前书传式,按鉴演义,补入遗漏。自盘古氏分天地起,演至商朝纣王宠妲己止……一一开载明白,使

①《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出版。《集成》收录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数十种。本文涉及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等,均见于《集成》。

民知有出处,而识其开辟至今,皆有考实,不至于附相讹传矣。”大冢秀高认为《古本小说集成》收录的《列国前编十二朝传》,是天理图书馆藏本的同版后印本;并且指出天理图书馆藏本所署的“三台山人余象斗仰止集”、“闽双峰堂西一三台馆梓行”,“署不成对句而有挖改的痕迹。此书应为后修本,所以正文中‘仰止子’、‘余仰止’、‘仰止余先生’等共十处,均有后修或者修改先行底本的可能性。《叙历传始末》所云也有些疑问。卷四中有‘万历丁亥三月……至辛丑十月十九日薨终’,可见原刊本刊行于万历辛丑二十九年以后崇祯二年以前”^①。倘真如此,便不能排除余象斗翻刻、重编他人之书的可能性。

《盘古至唐虞传》,全称《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二卷七则。书林余季岳刊本。封面上图下文,图左书“自盘古开天地起”,右书“至唐虞交会时止”。封面中题“盘古志传”,右上题“钟伯敬先生演义”,左下题“金陵原梓”。首有钟惺《盘古至唐虞传序》,云:“今依鉴史,自盘古以迄唐虞事迹可稽者,为之演义,总编为一传,以通时目。”正文首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卷末附余季岳识语:“迩来传志之书,自正史外,稗官小说虽极俚谬,不堪目睹。是集出自钟、冯二先生著辑,自盘古以迄我朝,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以通俗谕人,总名之曰帝王御世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四方君子以是传而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帐簿也哉。”据此可知,余季岳曾计划以“帝王御世传”为总名,刊刻自上古以迄明朝的历代演义。但后来只刊刻了《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便草草收场。大冢秀高根据书中“由”字或讳或不讳,推测此书当刊行于启、祯间^②。《有夏志传》,全称《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则。《有商志传》,全称《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四卷十二则。均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有钟惺自序。两书版式与《盘古至唐虞传》相同,当为“帝王御世传”之第二集与第三集。

《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六卷八十回。封面版心中央大书“开辟演义”,盖是编之简称也。右上方题“钟伯敬先生原评”,左上方题“绣像”,左下方题“古吴麟瑞堂藏版”,盖江南刻本。卷首有序。序后署“崇祯岁在旃蒙大渊献春王正月人日靖竹居士王黉子承父书于柳浪轩”,崇祯旃蒙大渊献即乙亥八年(1635)。正文首题“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署“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

为了醒目起见,兹将上述五部演义的基本情况,列一简表,示意如下:

①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②参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盘古至唐虞传》,第253页。

作品名称	卷回(则)	编著者	序跋者	刊刻者	成书或最早刊刻时间
《列国前编十二朝传》	四卷五十四则 则目单句九言	“余象斗”?	(封面题记) “余象斗”?	余象斗梓行	崇祯二年
《盘古至唐虞传》	二卷七回 回目双句七言	钟惺,万历间进士,著名文学家(疑为伪托)。	钟惺自序	余季岳梓行	启、祯年间刊
《有夏志传》	四卷十九回 回目双句七言	钟惺?	钟惺自序	余季岳梓行	同上
《有商志传》	四卷十二回 回目双句七言	钟惺?	钟惺同上	余季岳梓行	同上
《开辟衍绎通俗志传》	六卷八十回 回目单句七言	周游?	王黉(序)	古吴麟瑞堂藏版	崇祯八年刊

以上五部上古史演义,均在书名、题记或序言中标出“按鉴演义”、“悉遵鉴史通纪”、“按鉴编纂”等字句,意在说明这些演义作品是按照“通鉴”类史书编写的。实际上,明代的历史演义,多半都是“按鉴演义”的产物。一般来说,“按鉴”之“鉴”,自然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不过,亦有例外,比如上述五部上古史演义,其所按之“鉴”就不是《资治通鉴》或《资治通鉴纲目》,而是它们的前续之书。对此,目前一些学者可能未甚措意,故而在评介这几部上古史演义时出现误断。

例如,徐朔方先生在为《古本小说集成》所收的一些明代历史演义撰写的前言中,就认为“按鉴”按的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而断言某部上古史演义所说之“按鉴”,“全不足信”。其《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前言》云:“此书编纂草率,文字拙劣,如卷首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从属于佛教;又如‘按鉴’云云,其实《资治通鉴》不记战国以前的史实。当时书坊廉价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印刷的水平可以由此窥见一斑。”其《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前言》亦云:“此书叙事自盘古开天辟地至周武王吊民伐罪止,而司马光《资治通鉴》叙事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两书各不相涉,而居然题为‘按鉴编纂’,可见‘按鉴’云云是当时小说家的俗套,全不足信。”无独有偶,何满子先生在《有夏志传·前言》中亦云:“本书所题‘按鉴’,也只是标目而已,其实并没有《通鉴》可按,也没有依照史书撰写小说。”其《有商志传·前言》又云:“书名虽称《有商志传》,但叙周事多于叙商事;且于古史见于载籍者极少,大部分内容都取自民间传说的神异故事……其实称不上‘按鉴’,而且这段历史实在也无‘鉴’可按。”孙玉明先生在《盘古至唐虞传·前言》中亦云:“虽然书名前冠以‘按鉴’二字,但上古历史确也无鉴可按。”其《有商志传·前言》又云该书所

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无史可稽的神异传说”。^①另外,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在评论“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的《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时亦指出:“所谓‘按鉴’,‘按’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是《通鉴》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要为超出《通鉴》范围之外的历史‘演义’,就根本无‘鉴’可按,于是只能依靠传说、加上作者自己的想象去敷衍成文了。”^②因此,他遂将这三部书从历史演义中剔出,归入神怪小说。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亦云:“所谓‘按鉴’,‘按’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是《通鉴》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要写上古史,没有什么‘鉴’可‘按’,只能依据神话和传说……所以,这四部小说(包括《开辟衍绎》)不能算作‘讲史’,归入神怪小说,可能更为恰当。”^③

表面上看,上述关于“按鉴”的批评,似乎皆凿凿有据,可实际却是郢书燕说,因为《资治通鉴》固然不载战国之前的史实,但是它的一些前续之书却专记远古之事。例如,宋人刘恕《通鉴外纪》即“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④。宋人金履祥《通鉴前编》亦记战国以前史事,上自唐尧,下接《资治通鉴》。至于明中后期流行的不少“纲鉴”类史书,其所记之史事,亦始于三皇五帝。如明末钟惺订正的《资治纲鉴正史大全》,该书封面版心中央大书“纲鉴大全”,右上题“陈明卿先生参订”,左下题“呈祥馆藏版”。首有宋元以来朱熹、尹起莘、薛应旂及明成化帝等所撰序跋多篇;并有“楚竟陵钟惺撰”《纲鉴正史大全题词》,谓其“有意乎名山不朽,退而作史怀,迄东汉、三国而止”;刊刻是书的“闽潭后学余应虬”在《资治纲鉴大全跋》中说,钟惺“督闽时曾有续编授予小子,因为之竟未竟之业”,也即是他参酌诸家史鉴,将钟惺所撰之《纲鉴》续补完整,并且他还将陈明卿所作之通鉴评语细抄下来,“鳞次于额,以备考古者之览观”。该跋语作于崇祯元年,可知该书当于是年刊刻。书凡七十四卷,并附《皇明纪要》三卷。其正文每卷开头均题“宋京兆道源刘恕《外纪》、兰溪仁山金履祥《前编》,明太仓弇洲王世贞补遗、景陵伯敬钟惺订正、闽潭犹龙余应虬汇阅”。正文每页上端皆有陈明卿的批语。该书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另有袁黄、王世贞所撰《纲鉴合编》,与《资治纲鉴正史大全》大同小异,有万历年间刻本。笔者曾将《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等五部演义与钟惺订正的这部《资治纲鉴正史大全》进行对勘,发现它们的叙事次序、主要情节内容等,皆与《资治纲鉴正史大全》基本一致。这里随举一例,以见一斑。

①参见《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339页。

②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③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三·编年类》,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53页。

《列国前编十二朝传》	《开辟衍绎》	《盘古至唐虞传》	《资治纲鉴正史大全》
第六则“有巢氏教民架屋避害”：（有巢氏）见人民与物相友，禽兽尚有同人宿食者。有巢氏恐禽兽之性不常，民受其害，教民架木为巢，掘地为营。架木为巢室，暑夏居之，掘地为营，寒冬居之，以备其不测。人民大悦。此时，尚未知稼穡，止食草木之实，又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后，而民自尔以安恬也。	第七回“有巢氏教民架屋”：（有巢氏）见人民出入相友，况禽兽尚与人同宿共食者。有巢氏恐禽兽之性不常，民受其害，教民架木为巢，掘地为营。架木营室，暑夏则居之，以避炎热；掘地穴居，寒冬则住之，以避冽冷，又备避禽兽之不测。人民大悦。自是，安居乐业。其时尚未知稼穡，而人民止食草木之实，又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以蔽前后，而民自尔以安恬也。	第三回“有巢燧人氏为政”：话说太古时节，那些人民不过居在土穴，处在郊野，与物类相为友。人无心去害那鸟兽鱼虫等物，鸟兽鱼虫等物也无有害人之心。到得稀韦氏，百姓渐有机智了，或三五十人，或一二十人，见那良善畜类，赶去几拳几脚，大家把来打死。物畜怕人害它，也不觉的展出爪牙，与众人格斗。……有巢氏呼集众民，教民折下树梢，从矮枝架高枝，层层搭成如梯一般，可扳缘至大树末，架成一个巢窠，上蔽得风雨，下又栖得身，教民居在其中，曰：“若遇猛兽，便爬上树，他就无奈我何。”……又教民曰：“那鸟兽的皮毛血肉皆有用处。他的皮，男女俱可剥将来，缚在下身，以蔽前后，他的肉可吃，也似橡栗堪食。”	卷一“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处，搏生咀华，与物相友，无有妒伤之心。逮乎后世，人民机智，而物始为敌。爪牙角毒，概不足以胜禽兽。有巢氏作，构木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实。未有火化，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后取而蔽后。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三部演义小说所叙之事，基本上源自于史鉴的有关记载，只是其叙事显得生动丰满一些、语言更为通俗易懂而已。因此，《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等书所标之“按鉴编纂”，确非虚语。《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皆署名“钟惺编辑”，学者多认为此系伪托。可恰巧《资治纲鉴正史大全》亦题“钟惺订正”，并且它与《盘古至唐虞传》等皆由建阳余氏书坊刊行，不知“钟惺订正”是否伪托；如若不是，则“钟惺编辑”恐也不宜遽尔断为“伪托”。此外，“钟惺”在《盘古至唐虞传序》中曾提及“庐陵《路史》”一书，在《盘古至唐虞传》第四则中还说：“按上十五氏，世传伏羲氏之后，考《路史》丹壶名山之记，则十五氏先焉。岂当时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后世诸侯之国？未可知之。今依《路史》，以十五氏先之。”然则，该书之编撰也曾参考《路史》。《路史》乃宋人罗泌所撰。书凡《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馀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今将《盘古至唐虞传》所纪之“十五氏”与《路史》卷六《前纪》的有关内容比

对,发现前者确有不少文字抄自《路史》。如关于史皇氏仓颉造字,虽然《资治纲鉴正史大全》也曾记述,但不及《路史》所记详细,《盘古至唐虞传》即取《路史》所记,略加敷衍。见下表:

《盘古至唐虞传》第3则	《路史》卷六《前纪六·史皇氏》	《资治纲鉴正史大全》卷之一
有史皇氏出,名仓颉,姓侯罔。生得龙颜侈哆,四目灵光,有聪明睿智之德,生而能书,都于阳武地方。一日著巡,登阳墟山,临于玄邑之水。忽然间有洛汭灵龟,负书一册而来。这龟生得丹甲青文,以授仓颉。遂识天地之理,穷天地之变化。他仰观天文,见奎星圆曲之势;下察地理,见龟文、鸟羽、山川、掌指之形,道:“天地间有如许物理,并无名象,凭世人懵懵懂懂,东指西画,糊糊涂涂,名象不传。我不如就天文地理、山川鸟迹之象,标个名头,又就名协个声贝,以相生为字。”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罔。生得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授河图绿字(《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墟之山,临于玄邑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帝……)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形位成,文声具,以相生为字。	史皇氏:仓帝史皇氏,名颉,有睿德,生而能书,及长,登阳墟之山,临于玄扈、洛水之汭。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帝受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

尚需指出的是,《列国前编》、《开辟衍绎》中凡遇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均有注释;编撰者在每回故事之后还附加了“释疑”、“鉴断”、“地考”、“补遗”、“附纪”、“史臣断曰”等文字,这些注释与附加的文字,其实绝大多数并非出自编撰者之手,而是直接抄自《资治纲鉴正史大全》等“纲鉴”类史书。如《列国前编》第十二则“七帝相继传位承天下”所附之“释疑”、赵雪航与丁南湖的评论,第十六则“元妃教民育蚕治丝茧”所附之“评断”,第二十三则“颛顼灭黎降伏四夷地”后的“附纪”,第二十八则“四岳举保崇伯治洪水”所附之“补遗”,第三十一则“舜帝命禹治水救民”所附胡五峰的论断,第三十五则“重康即位逢日食大变”所附之“鉴断”,以及第四十八则“盘庚作歌复兴汤王政”所附丁南湖的评论等等,均见于《资治纲鉴正史大全》。书中只有四则议论文字标明为“仰止子”(即余象斗)所评。

顺便一提的是,《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虽然所叙史事与《列国前编》大体一致,但是它们在史料基础上所作的想象与推衍却颇不同于《列国前编》,其通俗性、传奇性与趣味性明显超过《列国前编》,因此,它们与《列国前编》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